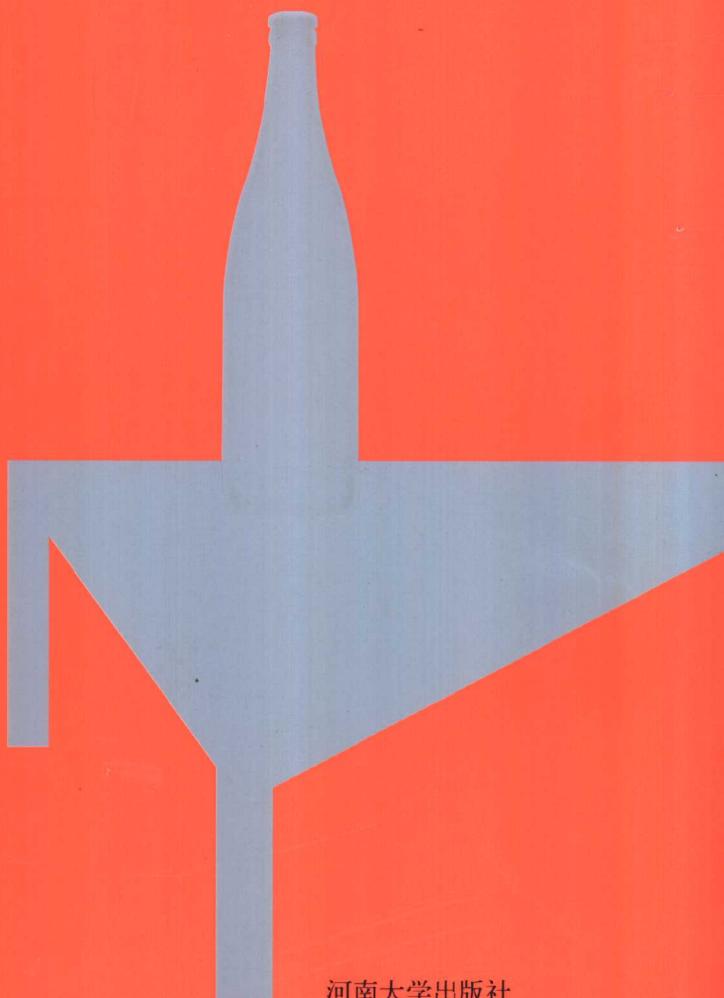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主编 陈定家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主编 陈定家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陈定家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9

(新思潮文档/金惠敏主编)

ISBN 7-81091-088-4

I. 全… II. 陈… III. 知识分子-文集 IV. 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285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袁喜生

责任校对 高冬可

责任印制 苗 卉

装帧设计 张 胜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E-mail: bangong@hupress. 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mm×96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2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7—81091—088—4/I · 203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金惠敏

总序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曾经自信地划出了一个相对于“文革”的“新时期”，那确乎是群情激扬、光辉灿烂的峥嵘岁月。不过今天从思想史或者思想创新的角度看，“新时期”之“新”似乎仅具有拨乱“返”正的意义，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它远承“五四”精神，近接50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关注的主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性、异化、马克思手稿、美的本质、现实主义等等，均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时而低抑、时而高亢的老话题，而且，“左”、“右”对垒，阵线分明。“右”者坚信只要冲破“左”的禁锢，前景就是一片光明；而“左”者则认定，“右”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动乱、无序和资本主义复辟。那时的“思想解放”其实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解放，要么就仍然禁锢着。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对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单纯而幼稚、激情而盲目，远称不上理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

进入90年代，思想界急剧分化，乱云飞渡，思潮翻涌。当我们感觉“新时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述我们当前的思想状况时，思想的“新时期”才真正到来。思维创新的佳境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它总是晦暗不明，难分难解，相互渗透，多种可能性并存。具体说，90年代的思想界不再是明朗的“左”与“右”，它呈现出思想作为一

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来，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儒家、全球化、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身体注视、传媒哲学等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以其他所有的问题为其语境。

但是如果将思想还原为现实，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以及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思想界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让传统发扬光大，如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就是让传统自己说话，而在中国则除了这层任务之外，更加之以如何与西方这个“他者”相对话。“传统”与“他者”可能就是当今最大的哲学问题。

将这些 90 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熟或者完成使命。应该承认，这些思想还嫌稚嫩，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定论。但是，它们是我们走过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更蕴涵着无限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那么这些文本之作为历史资料的参照意义甚或作为思想地图的指示作用将都是不言而喻的。

知我者，罪我者，我们一概表示感谢。

惶惶然，谨此为序。

2003 年 8 月 29 日
北京花园村

陈定家

导 言

就全球范围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变成热门话题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动向。从《人大复印资料社科研究论文索引》收录的数千万篇论文看，1978 年到 1985 年没有一篇专论全球化的文章。1986 年以后，国内报刊出现了零星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全球化研究情况的短文。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全球化研究才开始引起中国学界的真切关注。但是，论文的数量相对来说还不算太多。1997 年以前，专论全球化的论文总共也只有 200 多篇。此后，相关论文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连年增长，到 2001 年，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文章数量一年就高达数千篇！在人大复印资料 2001 年卷收录的 169336 篇文章中，仅论文标题中含有“全球化”字样的文章就有 1386 篇。从统计资料看，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学术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有人套用了一句“红学”研究中的俗语来形容目前“全球化”研究的火热局面：“开坛不说全球化，纵论诗书也枉然！”这个说法也许不尽妥当，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的确已然摆在了中国当代学人的面前，那就是“言必称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一大景观，尽管“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那么，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呢？这毕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 “全球化”的本质和内涵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或词语,在世纪之交已被三教九流当做一个包罗万象的新概念,它正经受着五花八门的过度阐释、匪夷所思的随意使用和漫无边际的自由发挥。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全球化”一词至迟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有资料表明这个 globalization 在 1944 年就已经出现在西方人的著述中,到 1961 年,这个词语被正式收录入权威版本的韦伯斯特词典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曾想到,这个当下时髦至极的词语却原来已历尽沧桑,蹉跎了大半个世纪的青春岁月,如果以人喻,它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于青丝变白发的曲折而漫长的成名之旅。

然而,这里所说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如此引人注目的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它似乎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前后几年才在不同学科频繁出现“轰动效应”。目前全球化理念正以日渐快捷的步伐强行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公平交易”而“交易公平”的 WTO、颠覆存在与虚无的因特网、割断历史联系的“刀砍母”(.COM)、超音速国际航班、无边界超级市场、癌细胞一样飞速扩散的城市人口……这一切彷彿突如其来,但是,当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时,却惊奇地发现,“全球化”的航船却又彷彿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启航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日渐密切的“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内涵是否一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毕竟,对于什么是全球化,我们仍然还有太多的困惑。这里,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76 页。

重新看看另外一些当代学人对“全球化”概念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费孝通曾著文把“全球化”概括为“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联”，并简要地勾勒出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态势。^①他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可追溯到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航海技术克服了海洋障碍，人类的洲际交通成为可能，加上后来以机械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使西方那些生产力领先的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成为可能。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向亚非国家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过程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资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种种空间障碍。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和频次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组织的革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生产要素和世界市场进行了新的整合。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模式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了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为主导的局面，正在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强大趋势。这是包括中华民族、炎黄文化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处的历史阶段。总之，世界“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可以说就是“全球化”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内容。

有研究者把目前学界对“全球化”基本涵义的认识，归纳成这样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是说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全球化的世界即所谓“大同世界”，并非是全球统一到一个模式，同只能存在于不同之中，欲大同则必存大异。第二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二层。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而广义的“全球化”则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第三种意见认为，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各种要素流动、融合并构成超国家

^①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教学科研参考》2000年第12期。

的全球体系的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第四种意见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讲,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第五种意见认为,当前全球化这个词有被泛用的倾向,如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全球化本质上应该是专指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①

当然,还有很多比较具体的看法。例如,“全球化是人类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包括人类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冲破自然空间和时间的阻隔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自由交往活动。”“全球化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全面形成,是金融资本、物质财富和人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曼德尔和杰姆逊都提出过类似的论点),“全球化是文化或文明的全球整合”,或者“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②“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③全球化就是“跨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扩展过程,并对地球另一区域的民众和社区产生广泛(extensity)、强烈(intensity)和快速(velocity)的影响。”^④……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研究全球化应当避免单向思维。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全球化固然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

^① 参见王玉恒《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讨论综述》,《学术界》2000年第6期。

^② 参见杨金海《全球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热点问题》,《新兴学科》2000年第1期,第7—12页。

^③ 丁志刚《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

^④ 洪朝辉《全球化——跨世纪的显学》,《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

村”,“世界社会”。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革命、通讯技术革命扩大了人的视听和行动范围的结果。^①

以上各种意见,共识多于分歧,虽然它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强调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依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等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它们的核心内容仍然是世界“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就算全球化本质上是“专指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政治和文化也必然会紧跟其后,而不大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逆潮流而动。更何况,“全球化”肯定不会只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行为;“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想像运动,始终包含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权力意志,并且从一开始就已经为自己内在地确定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这样的关联性目标。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种以经济行动策略来实现的新的文化整合过程,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能够在某种“普遍性”设计中,瓦解任何一种保持自身特殊努力的文化自足体,进而完成对于世界文化前景的“普遍化”构造。^②

有人说,“全球化本质上应该是专指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作为一家之说,这个论点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学者有权利对自己使用的概念之内涵做严格的限定,这应该是起码的学术自由。但是,用“经济全球化”来否定“文化全球化”似乎显得有些武断。马克思在讨论“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时强调说:“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③这里的“精神的生产”理所当然包括“文化”在内。因此,说全球化只是经济领域的一种倾向在我看来是说不通的。

二 “全球化”作为多元概念的多重意义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苏轼说“横看成

^① 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② 王德胜《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陷阱》,《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认识的地点不同所造成的“空间”的差异；庐山还是那个庐山，它可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真面目”，只是“立场”不同的“苏轼”感觉和理解不一样而已。李白说“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认识的时间不同所出现的“时间”的差异。无情的岁月把青春浪漫的“李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明镜”，青丝就是青丝，白发就是白发，镜子毕竟可以相对客观地再现它面前的事物。杜甫说“天上浮云如白衣，须斯变幻如苍狗”。这是对“无时无地无变化”的无常世事的感慨。浮云岂有“真面目”？“白衣苍狗”本无凭！永恒即瞬间，“惟变为不变”，这是否可以说是一种不分物理和心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苏轼说的差异是因观察者的“立场”不同所引起的主观感受的不同（尽管它也体现了哲人对感性局限的超然觉悟）；李白说的差异是被观察者自身发生渐变的前后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虽然同时也包含着诗人对感性经验的肆意夸张）；杜甫说的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浓郁复杂的主观情感和变化莫测的人情世态相互作用的结果。

同样，当我们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意义相对固定的概念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名词”看待时，对全球化的各种不同的认识类似于苏轼所说的情况；当我们把“全球化”看成一种发展状态或者把它看做一个“形容词”时，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是否类似于李白所说的情况？当我们把全球化看做一个变化无定的发展过程或者作为一个“动词”看待时，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更类似于杜甫所说的情况。当然，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对“全球化”做这样的词性划分难免有些牵强，甚至显得不伦不类，但我们借词性分类的说法来类比全球化的不同含义和人们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却有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至少，这种类比法隐含着强大的描述功能和深厚的解释潜力。我们相信，要深入理解“全球化”这样一个多元概念的多重意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复合探索和交叉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西方学者贝克曾把广义的全球化划分为全球性、全球主义，以及作为发展进程的全球化三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层面各自的特征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三种“词性”：全球性——形容词（偏重既成的事实）；全球主义——名词（趋向未

来的设想);全球化——动词(注重当下的实践),当然,这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游离松散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剖析,例如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不同角度,或者从历史进程、现实动态、未来构想的不同阶段,或者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不同层面对全球化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以单向思维或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考察全球化是行不通的,过去那种把难以驾驭的复杂事物要么神圣化要么妖魔化的极端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全球化讨论过程中,有人仅仅抓住全球性一个层面,声称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只能积极欢迎,大力促进。与此同时,有人只抓住全球主义的层面,把全球化看做西方资本统治世界的战略方针,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片面性。”^①这明显具有片面性的观点盛行一时固然令人为之扼腕,而更为可叹的是某些貌似公允的陈词滥调仍然充斥着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论述。

那些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却根本无视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论者,其实也与没有充分注意到全球化的多层意义有关。的确,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还远远比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和文化根本就不存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文化全球化进程也早就通过高科技的大众传媒迈开了惊人的步子。阿兰·伯奴瓦说到文化全球化的“新奇”现象之一是,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它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当然,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作为精神活动和审美活动,文化生产理所当然要比商品生产更加纷繁复杂、更加丰富多彩。但在经济生活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观念碰撞、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也必然日益加强。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借助于“大众传媒”迅捷地跨越国界的大众文化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最典型的莫过于动态图像文化的普遍

^① 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化与全球化”。^① 总之,世界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寰宇、席卷八荒。经济如此,政治和文化也是如此。

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天起,他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之中,在享受着同时也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使得他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巴西人等等”。^②因此,面对全球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潮流,我们实际上已别无选择,我们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现实,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在全球化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时,有人高呼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决心以“我化全球”的勇气和自信,大胆投身于“全球化我”的历史洪流中,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敬仰和珍视的。但是,仅仅有“勇气和自信”还远远不够,要想在全球化的大风大浪中做一个勇立涛头的弄潮儿,没有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雄厚实力是难以想像的。

“全球化”确实是一股来势凶猛的时代潮流,但我们毕竟不能把它等同于“洪水猛兽”。虽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确实有借用全球“共同繁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推行其“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乃至“军事霸权”的嫌疑,全球化的确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掩盖其侵略扩张政策的面纱,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浪潮已经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某些弱小国家正在变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形形色色世界组织中的跟班和附和者,但是,有些研究者据此断言全球化就是西方人为发展中国家布下的陷阱,却是我们所

^① 朱立元《雅俗界限趋于模糊》,《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② 谭君久《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无法苟同的。^①

这里列举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②克林顿的这番言论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陷阱论”者据此认为，克林顿所鼓吹的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的一种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便发达国家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将西方文化与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将大量财富运回本国。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灌输“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目的，即进行“和平”的侵略扩张，剥削发展中国家。^③

这种“和平”侵略说，与其说是经过严密的理性研究而得出的客观结论，还不如说是那些固守冷战思维模式的“陷阱论”者发出的一种饱含情感色彩的告诫。但是，这种在冷战时代看似天经地义的论调，却存在许多让今天的“陷阱论”者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从克林顿的话语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初始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在全球的利益，但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以损害全人类的利益为前提吗？这个“全人类”是否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排除在外呢？发展中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使西方文化与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如果这就是遭受“和平”的侵略扩张，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因近二十年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图式”，它主张民族国家应从抽象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来解决发展、环境等全球问题，其真实目的是要发展中国家放弃主权，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它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参见陈安国《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② 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③ 陈安国《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来采取“门户开放”政策而获得的巨大成功呢？克林顿认为“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是错误的，那么“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就必然正确吗？“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是美国人的专利吗？……这些问题，如果在二十年以前的中国，也许是令人困惑的，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所说的“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与马克思所说的“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克林顿把“国际互相依赖”与“美国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也认为各民族的“互相依赖”在加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单从经济的角度审视全球化，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全球化存在的论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那种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趋势的全球性扩张，仅仅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不过是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逻辑的角度看，经济的一体化也必然促进价值观和制度文化的协同互动，加速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从而形成全方位的社会一体化趋势。从本质上讲，全球化实际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①

三 全球化研究的现状及热点问题

就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言，不少学者（如费孝通、李慎之等）认为，全球化实际发端于 15 世纪末的欧洲，从 15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是其第一阶段；从 1880 年一直到 1972 年美元本位的终止，欧洲中心转向美国中心，是其第二阶段；

^① 参见王四达《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中山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是其第三阶段。^① 李慎之明确地指出，全球化进程应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算起。在那一年，从两百万年前诞生以后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而且往往相互隔绝的人类实现了最后的会合，随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地理大发现）与贸易的热潮（商业革命），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李慎之还将 1992 年作为全球化的下一个 500 年的开始，因为他认为 1992 年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绝对优势。^②

在李慎之看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 1992 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③

就全球化研究的历史而言，有人认为，全球化思想至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相当明晰的表述。对于这一说法，只要我们读一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就不难发现，它确有合理的一面。的确，马克思早在 150 年前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重要思想。但是，我们并不同意把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思想完全等同起来。因为，从学理上讲，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思想的提出和它的系统研究和阐释，实际上还只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有人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是“罗马俱乐部”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④ 也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全球化理论的是以埃及

^① 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 年第 3 期。

^② 李慎之《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及其价值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 年第 4 期。

^③ 李慎之、何家栋《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 年。

^④ 王小亮、郭芳《“全球化”论争综述》，《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

人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①有关“全球化”术语的“专利”问题还有许多其他说法。谁最先提出这个概念似乎并不重要,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多数学者不约而同地把全球化研究的起点定在 20 世纪 60 年代。

20 世纪 60 年代,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将各自的资本触须纷纷由本土伸向异邦,一个全球性资源配置的巨型网络正在纵横交错的各种“触须”的飞速延伸中构织成形。于是,全球化理论的胚芽在对这一时期全球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破土而出。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货币和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80 年代初,米歇尔·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里根、撒切尔夫人采用,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开始。债券市场阻隔的消除和非规章化逐渐完成,随后又引起了股票市场阻隔的消除和非规章化,金融全球化全面展开。90 年代初,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入了这一进程,金融全球化便呈飙升趋势,直到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政治、文化全球化也发展起来。于是,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90 年代中期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全球化研究再度升温。”^②

尤其在世纪之交,全球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火热态势,形成了一门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显学”。许多有影响的西方学者对全球化思潮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其中不少理论和观点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例如,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说”、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托马斯·弗里曼的“全球化体系论”、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全球化比较观”、詹姆斯·密特曼的“全球化综合观”等等,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全球化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就我国学术界全球化研究的情况看,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和观点也很不一致。有谈“化”色变、认为一“化”必然就会亡党亡国的“恐惧论”者;有认为全球化正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具

^① 杨金海《全球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热点问题》,《新兴学科》2000 年第 1 期,第 7~12 页。

^② 同①